



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可以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题展览的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记忆》以抗战馆的改扩建工程为线索，以卢沟桥为记忆原点，通过“一件文物、一个故事、一段历史”的结构，将历史场景与当代展陈紧密相连。不仅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深刻昭示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概括。

第一个数字：104。104天，这是我们从接到任务到成片播出的时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月，在北京狂风大作的那一天，我们走进了抗战馆。罗存

《卢沟桥：我们的记忆》

用数字铭刻记忆，看见精神的重量

□张艳菊

康馆长对我们说，他们9个月以来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包括春节。也就是从那一天起，6位导演带领的拍摄团队，就没有停下过脚步，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必须投入的热爱与信仰。

第二个数字：34。34座城市，是我们的拍摄版图。我们从卢沟桥出发，但我们的脚步并没有止步于此。为了追寻一段记忆、拍摄一位亲历者，我们的团队辗转了34座城市，采访拍摄了48位亲历者和文物捐赠者的故事。有的导演4月底离家，直到6月才返回北京。在吉林的考古基地，我们追寻杨靖宇将军的足迹；在山西左权县，我们跟随将军后人将一盆兰花献于墓前；在武汉，我们通过AI技术让英雄陈怀民“重返”以他命名的陈怀民路……这些看似分散的点位，最终通过文物与记忆的线索，串联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细致入微的民族抗战图景。

第三个数字：110。这是我们所拍摄的最年长的抗战老兵的年龄，而最年轻的也已经102岁。这意味着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开国少将、平型关战役的亲历者王扶之，

今年已经102岁。我们等了两个月，写了无数版本的策划方案，最终老将军的家人答应给我们半小时的拍摄时间。不到最后一秒，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采访机会。110岁的任世朝老人，每年都因为没有后代的战友烧纸祭奠，他说：“牺牲的战友太多了，没人会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进行一场抢救式的记录。因为我们再快的脚步，也追不上他们离去的背影。

第四个数字：3000。在抗战馆，我们面对的是3000多件沉默的文物。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让文物说话。经过多次策划，我们为每一件文物都制定了专属的拍摄方案，即“一文物一方案”。比如，抗战馆内有一张首次展出的革命烈士沈忠明的证明书。为了独家追踪这个故事，我们在安徽五河县见到了94岁的沈树敏老人，他是沈忠明烈士的小儿子。老人家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为此，我们邀请了模拟画像专家为沈忠明烈士画像，当94岁的老人第一次“见”到了在七七事变中牺牲的、32岁的父亲时，眼神里是无法形容的思念与情感。在这部纪录片里，文物不再是玻

璃展柜里的展品，而是通往历史深处最真实的隧道。

第五个数字：19亿。19亿是纪录片相关话题在全网的阅读量。好的内容更需要被看见。我们不是在做一部传统的电视纪录片，我们在进行一场全媒体传播的探索。其中，点赞量10万+的爆款短视频有22条；单条视频最高点赞量91.3万；我们运用AI技术让英烈“重返”人间，全网阅读量4991万；微博话题#卢沟桥我们的记忆#阅读量高达10.6亿。历史，就这样通过新的语言，击中了今天年轻人的心。

对于导演团队而言，这些数字看上去是冰冷的，但数字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滚烫的。104天，是我们的拼搏；34城，是我们的追寻；110岁，是他们的坚守；3000多件文物，是历史的证言；19亿阅读量，是时代的回响！

最终，这些数字都汇聚成一个词——重量。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量，也是落在我们肩上、必须传承下去的重量。

（作者系《卢沟桥：我们的记忆》总导演）



《重见天日》

在历史尘埃中寻找和平回响

□王璇

当站在辽源战俘营旧址营房内凝视窗外，将军们80年前种下的榆树，此时宛如巨大的绿色屏障，风吹过时，抖落一地闪烁不定的碧波涟漪。仿佛时间已用最柔软的方式，抚平了大地所有的创伤。

辽源战俘营——这个曾被日军列为“极密”、连战俘们都不知道身处何地的坐标，如同一个被从地图上抹掉的墨点，险些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纪录片《重见天日——对话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以下简称《重见天日》）采用“战俘日记”与“后人寻访”双线结构，将这段曾被刻意掩埋的历史，用影像记录一场跨越时空、国界与历史伤痛的集体追忆与深刻对话。

1945年，日军撤退时销毁了这里绝大部分档案，以掩盖虐待战俘的罪行，也试图抹去他们战略转移、扶持盟军最高级战俘以作“人盾”的秘密图谋。这是一个被时间与刻意掩盖双重封存伤痛角落。

作为导演，初次接触这一独特选题时，就意识到这个“故事”很特殊。它并非英雄叙事，投降被俘的历史往往是边缘化的，而且将军们的遭遇无法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活体实验等针对中国平民的极端暴行类比，这也是这段历史真相一直被掩埋的原因之一。这段发生在中国东北战俘营的历史确实没有主战场的“热血”，但在我看来，呈现这段历史的意义远超过历史空白，它如同在宏大的战争浮雕上，凿刻一道通往人性深处、跨越国界隔阂、直抵战争核心黑暗的秘密通道。

辽源战俘营研究小组曾远赴美、英、日、荷寻访。从美国将军府邸的书房到荷兰档案馆的库房，从大英博物馆的资料室到日本研究学者的办公室，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记忆碎片终于被拼接在一起。如今当我们手握历尽磨难才得以重见天日的将军回忆录，当设备间播放出穿越了80多年的将军颤抖的录音，当幸存者的后人回忆着父辈祖辈的屈辱与坚忍，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视角、不同载体的信息终于跨越时空，与我们进行对话。

寻找真相，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中国土地上的盟军战俘史，更是还原人类在极端暴力下的共同苦难史，以及其中闪耀的人性微光。

主流战争叙事偏爱凯歌与壮烈牺牲，而战俘——尤其是被公开宣传为“耻辱性投降”（如新加坡沦陷）的高级将领，往往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拍摄他们，意味着主动打破关于战争“非胜即败”“非英雄即叛徒”的简化滤镜。辽源战俘营内的将军们代表着战场失利的另一方，他们如何在极端屈辱、饥饿、绝望中坚守信仰和希望，这揭示了尊严并非胜利者的专利，它展现的是战争对个体精神摧残的另一种极致形态。

温莱特、珀西瓦尔等人并非普通士兵，他们是东南亚战场上的最高级别将领。当他们被剥夺尊严、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摧残时，展现出来的真相是，在战争的碾压下，军衔、国籍、身份皆如尘土，人性在极端环境下平等地承受煎熬。日军暴行的体系化、对人性的泯灭，无差别地施于所有被其控制的人群，这就是法西斯的本质。

这是一座联通东西方的“记忆桥梁”。对于西方观众而言，太平洋战争的盟军视角是他们理解二战的一个维度。辽源战俘营的秘密关押，尤其是被俘将军们的故事是一个“抓手”和“切入点”，能有效吸引他们关注这段历史。当他们深刻理解了在辽源发生的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为何日军的暴行在中国战场会以更广泛、更残酷的形式发生，这有助于在国际语境中更全面地揭露日军在亚洲的战争犯罪。

片中强化了中国人民在这段历史中的双重角色：“受害者—援助者”。观众从片中可以看到，这些战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囚禁和虐待，但获救的关键时刻，也离不开中国当地百姓和政府组织的无私帮助。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视角的表达。在中外人士、专家学者和幸存者后人的合力帮助下，这段曾被刻意掩埋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特别是今年已78岁高龄的日本自由媒体人西里扶雨子女士，她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际主流媒体工作，参与揭露日军暴行的纪录片制作，所以通过她可以了解关于战争记忆研究的核心文献，采访到国际上研究二战历史的专家，她为片子提供了很多线索。作为一个日本人，她代表了一种直面历史、勇于反省的理性力量。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经历过战争的人逐渐离世，即便有战争的证言，人们也会逐渐漠视它。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向下一代人传达这些，必须传达真相。”

苦难不应被遗忘，珍爱和平是我们永远要去传达的主题。我们怀着最深切的敬畏来制作这部纪录片，将“不应被遗忘”的故事郑重地交还给世界。真相，只有在开放、多元的探寻中才能坚实确立；历史的今天，需要全人类共同承担。在全球局势依然复杂的当下，在战争的幽灵从未真正远去的当下，《重见天日》不仅是对过去的凝视，更是向世界发出的深切呼唤：勿忘历史，珍视人性，守护和平。

（作者系《重见天日——对话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总导演）

《正义之战》

以今日之镜头，显影昨日之真

□石鹏

回望《大抗战》，那是我们用影像书写的一部民族记忆长卷，它为历史立碑，也为未来留声。但历史的叙述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被重读、被深化。那么，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以纪录片为媒介，让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产生新的共鸣？带着这样的思考与使命，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义之战》正是制作团队在10年沉淀的基础上，再次推开了历史之门。

随着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历史研究不断深入，纪录片技术日新月异，我们深知，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思考、更创新的表达，才能打造出一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品力作。为还原历史真相，提升纪录片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价值，《正义之战》制作团队专程奔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及欧洲多地探访，收获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及视频素材。这些跨越国界的心血征集，使得散落世界各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拼凑完整。

2024年4月，摄制组在日本东京发现了一份1928年2月在日本政府内部流传着的，被标记为“极密”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提出，要将中国东北丰富的矿山、森林、土地等资源

为日本所用，并提出了具体的侵略方案：设法把中国东北的行政权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制造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政府。这是日本右翼的建言书，也是日本侵华的路线图。

制作团队走进联合国官方档案库，面对那些泛黄却依然清晰的珍贵档案，仿佛与尘封的历史瞬间隔空对话。这些文献静静地安放在档案库中，记录着世界格局转折的印记，也见证着中国抗战的血火征程。历经多年跨国探寻积累，海量新获素材被融入《正义之战》，《正义之战》也为铭记抗战胜利80周年呈交了一部史料更丰沛、视野更广阔的全新史诗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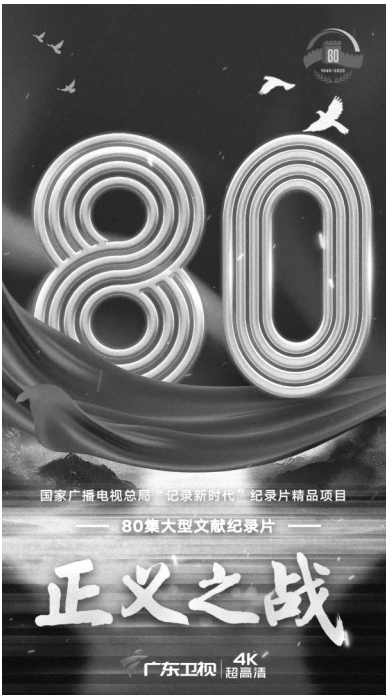
从九一八事变拉开14年浴血奋战的序幕，到西安事变促成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从《论持久战》的战略智慧，到百团大战的千里破袭；从中国远征军异域鏖战，到开罗会议确立四大国地位……《正义之战》以“中国战场”为核心坐标，辐射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壮阔版图。以二次大战珍贵影像资料为主要表现结构形式，结合现场录制拍摄，厘析历史，再现真实，完整再现中国全民族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详细解读前因后果，客观评述政治、军事、经

济、民生、文化、外交、人物等领域细节，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从宏观上讲述历史，从微观上分析历史。

《正义之战》以历史事件与人物为桥梁，挖掘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意义，打破时空界限，构建历史反思与当下价值的关联；依托珍贵档案、文献及影像，通过多维度交叉考证，构建权威历史叙事；打破传统编年体“以时间线为核心”的框架，采用“以事带人，以人叙事”的网状结构。

《正义之战》以单集独立叙事为“点”，多集串联形成历史脉络之“线”，最终构建全景式历史图景之“面”，实现微观故事与宏观叙事的统一。规避传统编年体流水账式叙事，通过“碎片化表达、系统性关联”适配新媒体时代观众观看习惯，既降低认知门槛，又保留历史深度。通过“历史真实、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传导链条，实现“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深层目标。

当镜头掠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瞬间，定格解放区战场全面反攻的胜利旗帜，《正义之战》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历经14年浴血奋战，从屈辱走向胜利的伟大精神涅槃的历程。每一帧画面，都是对历史的叩问；每



一段往事，都是对和平的呼唤。

《正义之战》以史诗级叙事，深刻诠释中华民族从屈辱到胜利的精神觉醒。紧扣中国全民族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紧扣中国全民族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展示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讲清楚中国全民族抗战过程中的灾难史、奋斗史、胜利史。《正义之战》不仅是一部历史长卷，更是一堂面向未来的公开课——它告诫世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作者系《正义之战》总编导）

《心安何处》

“理解”是拍摄时最艰难的部分之一

□谢申照

裴说过，厂里有一位姓董的爷爷就是日本人，是战争时留在中国的。为了更深入了解这个群体，我们在拍摄前搜罗了一堆书籍，请教了一圈专家，摩拳擦掌去寻找拍摄对象的时候又碰到了难题。由于90%以上的遗孤后来都回到了日本，所以在中国寻访日本遗孤非常困难，少数能联系到的遗孤又因为身体等各种原因不愿接受采访。最终，我们只拍摄到一位生活在辽宁的日本遗孤董利峰。后来我们又通过民间团体联系到好几位在日本的遗孤，他们分散在日本各个地方，年纪最小的80岁，最大的87岁。

这一次拍摄《心安何处》，我们没有用宏大的视角，而是选择小人物的故事，并回归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用长镜头的跟拍和隐忍克制的表达。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我们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得，只想展现这些遗孤老人当下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成为片子的主角。为了保持这种风格的统一，我们也没有使用专家或者相关人士的采访，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片中的旁白尽量减

少，可能唯一的情感流露是在片子的结尾，对着樱花飘落的镜头写下“花开花落，一生便这样过去了”。如同一声叹息。在配音时，何婕老师试了好几种表达方式，最终我们觉得，淡一点也是一种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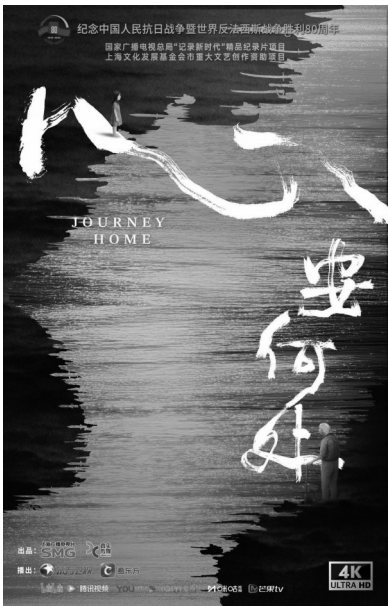
从今年4月到6月，我们辗转中国哈尔滨、牡丹江、长春、沈阳、凌源和日本东京、埼玉、名古屋、熊本、大阪等多地拍摄，共采访15位日本遗孤，最后选取了其中的6位遗孤和1位遗孤二代的故事在纪录片中呈现，留下超200小时的超高清纪实影像，遗憾的是很多故事还未完待续。非常感谢所有出现在片子中和为片子提供帮助的人们，特别是那些遗孤老人的坦诚相待。每一次流泪都触动人心的，也让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跟拍摄对象共度一段人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我记得，在去牡丹江的高铁上，听81岁的池田澄江会长讲述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池田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我眼泪差点流下来；我记得，在辽西小城凌源的江边，陪着83岁的

董利峰奶奶和范爷爷散步，他们连背影都是幸福的味道；我记得，85岁的松田桂子奶奶爱唱歌，虽然她的人生充满了苦难，但唱起歌的那一瞬间眼里有了光彩；我记得，请80岁书法家木村成彦老师为我们题写片名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心安何处，何处心安，好名字啊”……每一位日本遗孤的故事都令人唏嘘不已，我从一个个小瞬间去了解他们，也记住了他们。

这一次拍摄纪录片《心安何处》，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理解”是拍摄纪录片最艰难的部分之一，理解之后才有表达。面对另外一个生命，我诚惶诚恐，因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部分往往比说出来的还要重要。我想看这部片子的人不一定要哭泣流泪，更希望大家能保留一份理性思考，对战争、对亲情、对人生有所感悟。因为对于走到人生暮年的日本遗孤来说，生命中最激烈的部分已经过去，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记忆和表达更加纯粹，他们是生命的主角，我们有幸窥见。

（作者系《心安何处》总导演）



拍摄日本遗孤这个题材，最好的时间是40年前，这是我们在纪录片策划阶段就意识到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遗孤访日寻亲的高潮，中国的养父母还健在，遗孤们也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对于纪录片来说，那是故事最丰富饱满的阶段，可惜我没有赶上，只能看着前辈们的作品感叹。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趁现在还有少数的遗孤健在，留存他们的口述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状态。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日本遗孤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小时候听长